

世界之危境

譯 克 姚



世界之危境

著 原 士 博 迪 艾 國 美

譯 克 姚



海、上

路 川 四 北

行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法學士姚克禪述

世界之危境

吳修然署

凡爲整個世界謀福利之計劃，決不能忽視
中國之福利與保障。

——
史汀生

序

艾迪博士(Sharwood Eddy)生平足跡遍天下，所以是個富有世界智識的人；他的世界智識不是從書本或傳聞得來的而是實地觀察的心得，所以他是個實質的世界學者。

他一生的光陰都是用於環遊觀察世界及與世界各地的學生，青年，以及政治，實業，社會，宗教各界的領袖相接近；在過去的三十四年中，他大部分的時間是消磨於亞洲的。自一八九六年起，他在印度逗留了十五年和印度學生相攜手。以後二十年中，他在遠東，近東，北亞洲，南亞洲等處繼續其觀察和社會工作。他初次來華時，滿清尚未覆亡，西太后方在專政，思用拳匪來掃除歐美在華的勢力。以後他曾屢次來華，在各地演講及從事於社會工作和觀察，他的名譽是國內各界所共知，不必再多介紹。

九一八日本侵入瀋陽的時候，艾迪博士恰在當地，一二八上海戰事爆發，他又

來上海，所以他對於日本軍閥的暴行野心和當地實在的情形是明如觀火的。他曾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以個人名義發電報至國聯及美政府，證明日本軍閥之陰謀侵略及一手造成傀儡組織之事實，和中國方面之無辜及不抵抗。

他這一次在遠東費了五個月的時間在蘇俄，東三省，高麗，中國，日本觀察，纔寫了這本「世界之危境」(The World's Danger Zone)。據本書的觀察，現在世界上有二大危境，東有中國，西有德國，而日本和法國實爲東西兩大危境之「禍水」。若日本和法國不肯懸崖勒馬，只顧目前之利益，節節侵略，其勢將引起世界大戰使人類羅空前之浩劫及浩劫後之空前苦難。

艾迪博士以爲欲避免世界大戰，各國應速自覺悟，一致以輿論及經濟之壓力及非武力之和平方法，嚴格維護九國公約及凱洛白里安非戰公約。但是我們須知二十世紀糾紛及戰爭之癥結皆爲列強直接或間接所造因，而列強之所以直接或間接造成糾紛及戰爭，實由於帝國主義者私利之衝突。因有私利的衝突故有糾紛之生端，因有糾紛之生端故有軍備之競爭，因有軍備之競爭，所以劍拔弩張，一觸即發。歐洲

大戰之後，各國備嘗了痛苦，所以就有許多政治家和外交家鼓吹廢止戰爭和縮減軍備。其結果是組織了一個國際聯盟會和開了幾次國際的會議，定了一份國聯會章和訂了幾份國際的公約。列強一方面要想縮減軍備和避免戰禍，一方面却仍要保持以前用戰爭造成的現狀(*Status quo*)和用武力得來的「權」「利」。列強也明知公約不過是道德上的拘束力，而且就是認真縮減軍備也不過是捨本務末的辦法，何況這不過是會場上的空論和廢紙上的虛文罷了？試問英國是否肯縮減海軍而任其遼遠的屬地從容地叛離或被他國所攘奪嗎？法國是軍縮會中的大骨鯁，更不必說了。至於其他各國，強的有軍備的競爭，弱的有侵略的危險。誰肯縮減？誰敢縮減？列強也知道，除非他們放棄一切自帝國主義得來的權利勢力而以誠意實行國際間親善的合作，戰爭終久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他們不肯放棄權利勢力而妄想僥倖用公約來消弭戰爭。滿州第一聲鎗響的時候，舉凡各國大政治家外交家窮年累月殫精竭思所慘淡訂成的國聯會章，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等等都變成了一束廢紙。這就是我們當頭的棒喝。

艾迪博士的主張我們並不反對，但是從世界和平的根本上看，我們就覺得僅僅用輿論的影響，經濟的壓力及其他非武力的和平方法來維護國聯會章和國際公約，還是不澈底而無效的辦法。這種辦法充其量只能維持「現狀」：而環顧世界上被陵夷的國家和被壓迫的民族則環球皆是，國際間利益勢力相衝突的機會則不勝縷指——試問在這種局勢之下，我們的「現狀」有多少時候可以維持？

至於本書中的言論是狠大膽而直率。有許多地方我們或許不能接受或表同情，但是各人有各人的見解：我們所不能接受者不見得就是狂妄之談，而我們所能接受的也未必見得就完全是至理名言。我們知道艾迪博士是一個基督徒，而有深刻的宗教信仰的人們往往都有很偏頗的見解，所以本書有些地方不免蹈持論過偏之弊。但是，無論如何這却是艾迪博士忠實的見解。一個站在中日兩國立場之外的第三者的忠實見解是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的。這就是譯者遂譯本書的微意。

姚克

二十一，十，七於滬寧車次。

一 從瀋陽到上海

在過去的五個月中——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瀋陽的失陷（失陷的那夜我正在當地）起到一九三二年正月杪上海戰事爆發為止——我在無意之中親歷了遠東的戰區。我遇見中國的領袖人物：如統治東三省的張學良副司令，蔣介石主席，以及「基督將軍」著名的馮玉祥氏，曾任短時間南京政府主席的孫科氏，以及其他。最後我應日本自由派之邀請，就到該國去會他們，聽他們陳述日本方面的意見，並且把中國的情形和中國民衆的熱烈的憤恨和抗議告訴他們，因為日本的報紙是在政府嚴厲檢查取締之下，日本人沒有機會可以見聞到這些事。

我到中國去是應中國領袖人物的邀請，因為我相信這個不幸的中國是正和共產主義作一個殊死的奮鬥。在路程之中經過中國，高麗，和日本的二十五個主要的城市，從北滿的哈爾濱到南邊的廣州，從上海和華東沿海的各城到漢口和西邊的太原。在北滿蘇俄勢力範圍中首先經過的城就是哈爾濱。在該地的中國領袖人物告訴

我們說他們恐怕日本快要攫奪南滿了。我們所到的第二個城就是瀋陽。我們演講的程序剛在中途，忽然青天一個霹靂，一些也沒有預先警告，這攻擊就開始了。在九月十八夜十點三十分左右有一個轟炸的聲音，接着就是大炮，機關鎗，步鎗的聲音，徹夜不息。翌日早晨我們走到外邊時，我們不勝驚駭，方知日本軍隊下了攻擊，在數小時之內竟把南滿的五個險要的區域都佔領了。從那時起，日本的攻擊北及哈爾濱和齊齊哈爾，中及上海及華東，對於東部各海口更加以威脅。

翌日早晨瀋陽城內的景象使我回想到歐洲大戰。日本的軍士都戴着鋼盔排列着，他們的砲位也是很精密地佈置着。沙袋和鐵絲網令人猛然追憶一九二四年的浩劫。日本似乎預備得無所不至其極；他們的軍事設備和準備比較在大戰開始數月之後的協約國聯軍還要優良而週密。張學良氏早知日本有進攻的準備，三次命令他的軍隊不抵抗，並且要在日本軍隊邁進之前預先退讓。這是很明顯的，他要使日本沒有什麼宣戰的藉口，因為若然正式宣戰，日本就可以戰勝的資格而公然併吞東三省了。在數星期之前，電話線桿早已鋸好並且繫上柏油，預備軍隊進展後可以遞通電

訊。日本軍隊非但佔領了兵工廠，北大營和衙署，並且也佔領了鐵路，電話，電報，無線電台，郵局，銀行，國營工業，以及其他在瀋陽及各大城中的一切貴重的東西。我看見七個日本雇員在郵局裏檢拆中國人的信件，扣留一切從中國寄來的新聞紙和緊要的通信。

所有一切的中國學校都閉關了，就是重新開學也不准用舊有的課本。日本人最反對這些課本中所包含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因為這個主義是鼓勵中國學生去恢復失去的領土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尤其是日本用強權脅迫中國簽字的二十一條條約。日本在滿州用這種手段來管轄學校和郵局，當地人民的憤恨和高麗的人民一樣深刻。高麗雖然已經亡了二十年，但是我們覺得十分之九的高麗人和滿州全都受過教育的民衆（在日本佔領滿州之後）縱然承認日本建設了許多經濟事業，但是他們對於日本軍警的專橫暴虐，怨恨之心與日俱增。

有一個日本退伍的將軍在我面前自認道他們素常採用的苛刻而冷酷的武力政治實失滿州的民心。他又談及一個供職於日本鐵路的中國官員，有一次乘車遇見一個

日本收票員，他正在袋中掏摸乘車證的時候，那位不耐煩的收票員就拿札票剪批他的額，他這一來身體上精神上都受了創痛，他永遠不會忘記也永遠不能寬恕這種侮辱；在這位中國官員看來，這是日本苛暴的武力政治的一例。

在瀋陽陷落的次日早晨，有一個目觀的美國人告訴我說。當日本軍隊佔奪兵工廠附屬的運輸汽車廠時，廠中一百名手無寸鐵的工人正在宿舍裏睡着；日本軍士把炸彈向這許多熟睡的工人擲去，炸死了三十多人。其餘六十多人的衣服金錢都被搜剝淨盡，然後日軍把他們趕出去和四千多個被日軍強迫退工的工人，同在風天雪地中挨凍。舉凡一切張學良氏和他的僚屬所投資經營的工業，礦業，及其他事業，都被封閉及破壞。成千上萬的華兵都因此而打破了飯碗，流落四散於滿州四境。這許多兵因失業而爲凍餒所迫，自然流而爲所謂的「匪」了；日本的侵略間接增多了匪，而日本却以匪爲藉口，而無限期地借着保護日僑生命財產的幌子繼續用兵。其實無論任何戰爭都是足以危害敵方的生命財產的。

瀋陽陷落之後，我會晤了各國的目擊者，並且在我能力之內儘量觀察這整個的

情形。除掉日本人自己之外，遍滿州之內我簡直找不出一個人確信中國軍隊侵毀日本的鐵路是有什麼可信的證據。侵毀日人的鐵路是給予日本所極需要的機會和藉口；假使真有此事，那真是不可思議的愚而近癡的妄舉了。但是日本軍閥長時間的預謀，突然佔領瀋陽和南滿的各要區，却有狠多的證據。

在這事件發生的數星期之前，日本的報界就從事於一個極熱烈而狂暴的鼓吹運動，其目的在導誘輿論去做軍事策略的後盾。對於日本的間諜中村上尉被戕的事件更加渲染，使民意憤激。許多隊的日本飛機在全國的空中散下千萬張的傳單喚起通國人民來努力保衛他們在滿州的權利。傳單是用紅白黑三色印就，上面印着一面日本國旗，旗上寫着日本在滿州的十三種權利，旁邊畫着一隻利爪形的大手正在攫撲這旗，這隻大手是象徵着中國。在這旗的上邊寫着一句口號：『同胞們，快快醒來救國！』在下邊，畫着一幅滿州的地圖，上面寫着三行字：『日俄戰爭的費用是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本在滿州的投資總額是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我們同胞爲滿州而死的共二〇〇，〇〇〇人。』

在日本人看來最適當的時間和地點，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不知怎樣被拆動或是炸毀了。這一些小損壞在次班車到之前早已修好，而且也並沒有一班車爲了這一些損壞而耽延一秒鐘；但是日本軍隊竟在幾小時之內佔領了南滿的各主要區域。從那時起，日本開始了侵略的軍事行動，非但佔領了整個的南滿州，並且進攻到中國腹心之區。縱然日本能夠證實有幾個中國兵毀損了一二段的軌道，她這種類似戰爭的軍事侵略行爲也未免是小題大做。她屢次聲稱已在撤退軍隊，並且說俟日僑安全後，將全部軍隊撤退，但是她的話却與她的行爲不符，而使人難以憑信她所訴說的破壞鐵道的事了。

在瀋陽陷落的次晨，我取得了一面美國旗來做我們汽車的護符，因爲一切華人所有的汽車是都要沒收充公的。我就嘗試着去視察那所說的被毀損的鐵路軌道。我們剛到那張作霖氏被炸的日本鐵橋，猛然看見橋下六枝日本兵的步鎗桿對着我們。他們不准許我們去視察，但是到後來，這所說的被毀損的路軌却曾開放給各國軍事參贊和報館記者看過。

日本軍隊的週密計劃有許多證據可尋。中國的中央政府早料到日本此次的侵犯，所以曾經在事件爆發之前分送警告的覺書給美國和英國。南京和莫斯科方面都逆料有這事件。當太平洋學會的美國代表在莫斯科晤見加拉罕邀請俄國加入該會的時侯，加拉罕問他們大概什麼時候可抵瀋陽。他們說大約在九月二十日；加拉罕就告訴他們，到的時候大概滿州已在日人掌握之中了。

在瀋陽和南滿全境到處都有戰爭的景象，只有奉命退却的中國軍隊是毫無抵抗的。十萬多民衆恐怖地從城中逃出來。火車和船舶上都載滿了逃難者。在十月八日下午，十二架日本軍用飛機違背着他們正式的諾言到錦州擲下了四十八枚炸彈。這種攻擊是着眼於從瀋陽驅出來的中國的臨時省政府，要想把中國政府在滿州的最後根據鏟除淨盡。

在事件發生之初，日本就對世界說滿州的情形是一個純粹中日之間的事件，不容國際聯盟會和凱洛公約簽字國從中斡旋。日本對中國說滿州事件是一個純粹地方事件，南京政府不必顧問。日本軍事當局向滿州人民宣稱不願與張學良氏或任何與

東三省當局有關係之人物談判，只肯與他們自己新委派的中國領袖接洽。在過去的五個月中，日本的宣言和允諾很難與她的行為相符合，有時候簡直是背道而馳的。

在瀋陽，一切演講和集會都在禁止之列，所以我就從滿州乘飛機到高麗去。在那裏，高麗人告訴我們，日本併吞高麗的政策是分三個時期的。第一個時期是日本宣佈高麗脫離中國而獨立；第二個時期是日本宣稱高麗需要日本做保護者；第三個時期是併吞和沉淪。

我們在日本人管理下的報紙上看見「獨立」政府已在滿州成立的消息，於是就再回到瀋陽去。我們上一次經過滿州時，滿州正似美國的麻省和紐約省一般，一些獨立運動的呈兆都沒有。在十月五日有幾個中國領袖人物來與我會晤。他們說日本人曾經屢次執意地與他們接洽並且好幾天敦促他們在滿州建立「獨立」政府，但是他們始終堅拒不允。

一切交通和通訊的機關都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我們既不能穩妥地發電報，又不能安全地寄信件；所以在國際聯盟理事會剛要在日內瓦開會的時候，我們就動身到

天津。我的中國朋友們問我在這個危急情形之下有什麼方法可以救濟中國。我已經脫離了與任何團體的正式關係，行動可以完全自由，所以我就決計發電報到日內瓦，倫敦，華盛頓和南京。在瀋陽陷落的時候，有許多中立國人和外國的官吏及代表都在當地；但是他們差不多都有正式的職位或與某某政府有關係，所以他們不能公然無忌地證明這事件的事實或日本侵佔瀋陽時所發生的種種事情。

我在十月十二夜發出下面的電報，過去的數月中的事情都能證實這電報中的話。電稿原文如下：『瀋陽陷落時我正在當地。在當時當地所會晤的目擊者，其見證都能指明日本軍隊精密熟籌而預定的侵略計劃，中國方面絕無任何足以激怒日人的挑釁舉動。方今中國則困於水災，世界各國亦自顧不暇，日人此舉實使羣情憤激。日本軍隊並未撤退，而南滿各險要之區亦均在日軍掌握之中，錦州亦被日飛機投彈。

『關於努力建立在日本武力轄治下的滿州傀儡「獨立」政府的證據，我可以作證，我已發出了宣過誓的與滿州當地中國領袖人物的談話記錄，他們都證明日本人